

黃春明小說中的場域變遷

高禎臨*

【提要】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解釋當代社會結構時，運用了場域、生存心態以及資本等數種主要概念來討論一個社會空間的組成。場域是一種由各種社會地位所構成的多向度空間，活動於當中的行動者依據其所擁有的生存心態和資本力量來決定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且據以重新營造出場域的不同結構與氛圍。

本文主要是借用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與社會場域相互影響的理論，以黃春明歷年小說中隨著時空變化所產生的場域遷移情形作為觀察焦點，分析作品裡所呈現出來的幾個主要社會空間，並比較在各個不同的場域之中個體生存心態與外在環境相互影響的現象。

關鍵字：黃春明 現代小說 布爾迪厄 場域 生存心態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一、前言

黃春明是台灣六、七〇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鄉土文學作家之一，其創作時間從五〇年代一路寫到九〇年代，每一部小說的主題皆緊緊著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人或事；將他所有作品依照時間順序貫串起來，幾乎可以說是一部近代台灣社會發展的縮影。❶其作品受到眾多肯定的主要理由除了是刻畫了鮮明的小人物形象，並且傳達了作者自身敦厚的人道關懷；而小說中鮮明的寫實色彩，更能反映台灣不同時代與不同生活場域中特殊的社會現象，❷藉由對場景空間的細膩描繪與當地人物活動的生動敘寫，展露出不同的地域色彩、社會氛圍、生活樣態與人群思維。小說中所營造出來的故事空間，除了沿著時間之河不斷地向前行進，反映不同時代的社會演變情況，同時也隨著作家本身於真實生活裡環境的遷移，❸文學作品中因此呈現出社會場域在空間上的變動。

這裡採用「場域」概念來敘述小說中移動著的生活空間，而不用「場景」或「地點」，亦是因為場域一詞能廣泛地代表「地方」與「事件」的綜合，❹不僅僅是一個靜態地域空間的表現，同時涵括空間當中行動者的實際行為與抽象思維活動；場域除了是地域概念，亦包含抽象的力量運作與事件活動狀態的寬廣定義在其中。除此之外，並試著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❺的生存心態與社會場域相互影響的理論，來解釋小說中所呈現出的幾個主要的動態社會空間，並比較在各個不同的「場域」之中，個體

❶ 劉春城：「他（黃春明）的小說一直跟隨台灣近三、四十年社會發展動脈亦步亦趨，構成一部由鄉村到都市，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貧窮到漸漸脫離貧窮，一齣古老民族步入近代多采多姿發人深省的社會寫實連續劇。」參見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頁6。

❷ 歷來討論黃春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反映社會面貌與歷史記憶的學術論文數量之多不勝枚舉；在此不一一細述。

❸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文中即提到黃春明「透過俗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變遷，勾勒出一幅新的台灣民間社會圖像。」收於《成大歷史學報》25期（1999年12月），頁326。劉春城：《黃春明前傳》一書中則記述了黃春明現實生活中由宜蘭遷居至台北、最末又回到宜蘭的移動過程，同註1。

❹ 有關場域的定義，Elspeth Probyn曾針對「場域」(locale)、「在地的／地點」(local)和「定位」(location)三者加以區分，Probyn將地點定義為特定時間內的地方，定位則是將地點連貫成一系統，場域則更廣泛地代表地方與事件的綜合，既隱含外在定位，又代表欲望場所(site of desires)。Elspeth Probyn： "Travels in the Postmodern: making Sense of the Local." (*Feminism/ Postmodernism*, Ed. Linda Nichol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177-178。

❺ 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主要著作包括，《秀異》(*Distinction*, 1979)、《藝術的法則》(*Les regles de l'art*, 1992)、《布爾迪厄論電視》(*Sur la television*, 1996)、《再生產》、《世界的悲慘》、《實踐理論大綱》、《繼承者》等書。

生存心態與外在環境相互影響的現象。

布爾迪厄在解釋當代社會結構時，運用了場域、生存心態^⑥以及資本等各種主要概念來討論一個社會空間的組成；布爾迪厄所提出的「場域」(fields/champs)概念並非四周圍以籬笆的「實際地域」，而是一種「力場」。其認為場域乃是由各種社會地位和職務所建構出來的空間，行動者依據其所擁有的各式資本之數量與內容在場域中進行交換或競爭的工作，藉此維護或提升個人在場域中的地位；因此場域也可以說是一種權力的分配場。而一個社會整體空間又可以依據其不同的性質區分為許多個不同場域，並且各自擁有其不一樣的運作邏輯。^⑦

其中「生存心態」(habitus)則被布氏視為是個體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重要媒介，其貫穿者行動者內在與外在，既指導行動者的行動過程，又顯示其行為風格與氣質；既綜合了個體的歷史經驗與受教育的效果，具備一定程度的穩定性與持續性的同時，卻也可能受到外在的制約性社會條件影響而發生變化，^⑧而在不同的行動場合下不斷即時更新。就每一個個體而言，生存心態是決定其在社會裡如何活動、擁有多少資本、如何與場域中的其他行動者進行資本交換，以及佔據何種社會位置的關鍵性影響條件。

布氏觀察社會空間裡的行為者所擁有的資本類型，主要有四類：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象徵性資本。所謂的「經濟資本」指的是各種生產因素、經濟財產、收入、利益等，文化資本則包括一個人的秉性才能、文化財產，甚至是學位與文憑；以上二種資本則是構成一切社會區分化的主要原則與關鍵條件。社會資本則是行動者藉助所佔有的持續性社會關係網，進而能夠把握的社會資源；象徵性資本則為聲譽或威信一類的抽象概念，固然無形，卻能夠在社會活動中發揮強而有效的競爭力量。^⑨

「生存心態」、「資本」與「場域」作為一個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幾種

^⑥ 布爾迪厄著作中所用詞彙之原文為 habitus，中文翻譯有為：生存心態、慣習、習癖、習氣……等等；由於布氏相當強調其所言 habitus 具有雙重結構及特殊內涵；habitus 既兼備建構性、創造性、再生性之特質，同時也包含被建構性、穩定性、被動性兩方面雙重心態結構，筆者以為「生存心態」尤能彰顯布氏所欲傳達之 habitus 之精神，遂於文中採用「生存心態」之中譯。關於「生存心態」之中譯及內容詮釋係參考高宣揚《布爾迪厄》一書第四章〈「生存心態」的雙重結構及其雙向作用〉(台北：生智文化，2002)。

^⑦ 參閱高宣揚：《布爾迪厄》第五章(同上註)，與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第五章第三節。

^⑧ 同註6，頁8-9。

^⑨ 參見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爾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出版，2002)，頁72-73；以及高宣揚：《布爾迪厄》，同註6，頁248-253。

基本元素，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與所持資本的內容交相影響著，二者並同作為行動者在場域中進行活動與競爭的條件，決定行動者的社會地位；同時之間，資本的取得與交換以及社會位置的確立，則又回過頭來修正著行動者的生存心態。而社會場域是一種由各種社會地位所構成的多向度空間，活動於社會場域當中的行動者，除了依據其所擁有的不同資本力量和生存心態來決定他們彼此不同的社會地位，各式資本力量的流動交織結構成一個動態的社會場域，並也重新營造出場域的不同結構與氛圍。處於特定生活場域中的活動個體，也受到場域氛圍的影響，不停止地調整著自我的生存心態；不同社會所擁有的不同風格與不同價值觀念，也正是由於處於該結構當中的所有個體在場域中進行著各種力量的拉扯，以及資源交換後所塑造而成。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者並非處於一個簡單的對立關係，而是交叉影響、相互形塑，在各個不同的時間點上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動態」的場域空間，這是布爾迪厄社會學理論中的極重要的一個特點。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黃春明小說中隨著時空變化所產生的社會場域遷移情形，以及小說中不同生活場域所展現出來的不同氛圍與關注焦點；主要正是運用上述布氏理論中幾種關鍵性概念，包括場域、資本交換、群眾生存心態與實際社會行動，彼此之間交相影響，造就特殊的社會結構與場域氛圍的互動原則，來分析探討文本中呈現的幾個不同的場域內涵。正因黃春明不同階段之小說擁有特殊且鮮明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活動於不同生活場域中的角色人物，也與特定的時空氛圍之間產生深刻而密切的交互影響。借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將有助於我們透析小說人物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並能細緻地觀察與理解角色的社會處境與生存心態，同時探掘出文本中所展現出的諸種變化流動的立體空間。

二、黃春明小說作品的場域變遷情形

若就小說中的「場域」概念來下定義的話，所謂的「小說場域」所指即是在小說當中人物活動的實際場所，它包含著一般對於小說空間所要求的三方面內容：地域、社會與景物。¹⁰細讀黃春明所有小說作品，可以發

¹⁰ 參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頁 58-59。

現他創作時十分注重地域環境的安排，且在他筆下所設計的場景皆有強烈的寫實色彩，¹¹人物或故事材料亦是衍伸自個人實際經歷過的地理環境與生活空間；有形的時地景物勾勒出來之後，再進一步描述特定場域中人物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活動，於是各具風貌的社會景象與場域活動狀況躍然紙上。

諸多討論黃春明文學作品的研究者都曾依據個人研究主題上的需求來為他的作品分期或斷代，¹²以利於討論上的方便。本文所欲討論的既是其作品中的場域變遷情形，遂根據不同階段小說當中明顯的社會空間轉換現象，與其表現出的不同場域特色做出如下分期：1971年以前的作品時空背景多置於宜蘭農村鄉鎮，故事出現的角色人物絕大部分皆為生活在該社會環境之下的鄉村小鎮人物；故將此時期訂為〈鄉鎮場域時期〉。1971黃春明出現第一部以城市為小說故事背景的作品〈兩個油漆匠〉，內容描述雖仍以鄉下人為主角，傳達的則是鄉下人物到大城市裡打拼所面臨的挫折與窘迫困境，很明顯的人物生活場域已經轉換至城市裡。從此之後一直到1983年的〈大餅〉一作，作者的關懷焦點皆放置於城市場域中的人事物，僅有極為少數的作品是例外的。¹³因此該時期的作品，且訂為「城市場域時期」。黃春明八〇年代小說創作於1984年之後僅有四部，此後則待至1998年方有小說作品出現。從1986年的〈現此時先生〉開始，其小說故事所依據的時空背景又再度回到鄉下，作品的主題思想與關懷焦點轉移至城鄉差距漸甚的時代環境下鄉村裡的老年人，社會場域有了再一次的遷移。然而這個時期雖再度回歸於鄉間，其所要傳達的意旨以及小說中所展現的農村社會結構與第一期實有所差異，其將社會工商業化後所帶來的倫

¹¹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劉早琴之碩士論文《原鄉、北進、回溯——黃春明小說研究》即以黃春明小說的地域概念為研究主題，訂定「原鄉、北進、回溯」三時期，考證小說場景與實際空間景象，進行逐一比對之後，繪製出屬於黃春明小說的導覽地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¹² 文學評論家與研究學者對於黃春明小說的分期多採兩階段或三階段論述；前者如林瑞明〈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以1967年為界，分為早期和晚期。三階段論如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分為早期、中期、晚期。文化大學中文所周永芳碩士論文《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研究》關於台灣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作家介紹部分，則依黃春明作品風格分為初期1956-1967、成熟期1967-1969和後期70年代開始三階段；惟該論文完成於1992年6月，黃春明90年代末期以來所作小說則未能收錄討論。中央大學中文所梁峻瓊碩士論文《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第三章當中則以其作品發表園地為依據，分為萌芽、回歸、激撞、省思四階段。劉春城所著《黃春明前傳》中，則以1969年的作品〈鑼〉作為其小說視野由鄉村移向城市的轉折。諸文相關出版資料請參文末附錄參考書目。

¹³ 1971年〈甘庚伯的黃昏〉，1974年〈鮮紅蝦——『下消樂仔』這個掌故〉二作以樑寮仔為地名的鄉村社會為故事背景，其餘的1971-1983年作品皆將時空背景定位於城市或以定居於城市的人物為故事主角。因此這二篇作品亦歸入第一階段「鄉鎮場域時期」一併討論。

理價值、社會道德等觀念的改變，與原本質樸鄉村形成強烈的對比與衝突作為故事延展的基礎；因此這個階段則訂為「城鄉差距時期」。

下文的論述便是依循「鄉鎮場域時期」、「城市場域時期」與「城鄉差距時期」三階段，逐步討論小說家在不同時期的作品中所呈現出社會環境、場域運作型態，以及在當中生活的人群（所謂的社會中的行動者）所展現出來的生存心態與社會場域之間所形成的相互影響關係。

(一)鄉鎮場域時期

1.時空背景與社會型態

鄉鎮場域時期乃黃春明小說創作的最初始階段，除了最早的少數幾篇之外，¹⁴大多數的作品作者皆將故事的地理環境鎖定為自身熟悉的成長環境—宜蘭。¹⁵從文章中對於實物空間的摹寫以及人物生活方式的動態描述可以判斷，故事中所呈現之整體時空環境是一個五、六〇年代台灣傳統農村鄉鎮的生活場域，小說人物的生活範圍以農村、漁村、山間或是小鎮為主。場域中的人群謀生方式多半脫離不了對土地的依存，農耕與種植、牲畜養殖工作是該場域人群最主要的生存方式；¹⁶小鎮則相較於鄉村擁有比較豐富一點的商業活動與謀生型態，如〈阿厝與警察〉中的婦人阿厝於鄉間種菜再挑至鎮裡販賣，〈兒子的大玩偶〉中坤樹是「廣告人」，〈鑼〉中的憨欽仔以敲鑼通報鎮民鎮上之事；這些亦為該年代鄉鎮社會場域特有的職業。特種行業女子則同時出現於此時期與城市時期作品當中，但其生活環境、工作型態與角色的生存心態皆大有不同，本時期出現的〈看海的日子〉中的妓女白梅亦屬於鄉鎮場域特有的人物。

2.農村鄉鎮的社會結構與場域氛圍

依據上段對於鄉鎮人物謀生方式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農村鄉鎮的社會結構最大的組成成分，是一些從事勞力付出以謀取生活所需的中下階層

¹⁴ 如 1957 年〈小巴哈〉、1963 年〈把瓶子升上去〉以遍存的學校環境為故事背景，1962〈玩火〉則將場景置於東行列車之上。

¹⁵ 參看劉早琴碩士論文《原鄉、北進、回溯——黃春明小說研究》所作考證，即可確認本時期出現於黃春明各篇小說中的地名或場景，如：羅東小鎮、南方澳漁港、裸仔寮……等等，幾乎可以逐一在宜蘭地區得到印證。同註 11。

¹⁶ 〈青蕃公的故事〉中的青蕃公、〈甘庚伯的黃昏〉中的甘庚伯、〈魚〉中的老祖父皆以農耕為主業，或兼有畜養牲畜；〈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於南方澳漁港工作時所遇客人多為行海人，其後回到的家鄉坑底亦是以農畜工作維生；此類例子多見於本時期作品中。

小人物。於此場域中能佔據較高社會地位的是在農會、公所、警察局、學校上班的公職人員，再如擁有稍具規模的商業資源的小資本家，如電影院老闆（出現於〈兒子的大玩偶〉）或木匠師傅（出現於〈魚〉）；前者因為擁有較多象徵性資本或者是社會資本而提升在場域中的地位，後者則顯然因經濟資本的優勢而於場域中所處階層地位普遍高於基層勞動者。整體說來此時期出現於不同文本、但本質上相類似的農村鄉鎮之社會結構是比較不複雜的，場域中進行的資本交換主要以簡單的經濟資本為主，經濟資本又往往是帶動與操控其他資本的主要關鍵；擁有較多經濟資本（或起碼是一定數量的經濟資本）者於場域中同時能夠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象徵資本，甚至是社會資本，隨之佔有較為優勢的社會地位。黃春明於作品中雖然對這些佔據較高地位的社會階層著墨較少，但我們發現其所著重的中下階層人物之所以始終於社會結構中處於劣勢地位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經濟資本上的匱乏。

以場域中所佔有的社會地位而言，中下階級小人物幾乎無從利用資本交換的方式來對於原有的社會階級進行改變，因為本身所擁有的各種資本相當微薄；他們一般而言都是窮困的，經濟狀況幾乎成了他們生活中最首要必須考慮到的攸關生存之要事，連溫飽都難以滿足的話，更不用考慮到涉足文化、社會，進一步享有象徵性資本的條件了。例如〈魚〉中的阿蒼和祖父、〈癩〉中的阿發一家人、〈阿厝與警察〉中的婦人阿厝、〈鑼〉中的憨欽仔等，都是相當典型有強大生活壓力的例子。

在農村鄉鎮生活場域中，行動者最常面臨的壓力與撞擊有二大層面：一則來自現實生活的種種考驗（又以經濟問題為主），另則是與現代文明進入傳統農村後所產生的衝擊與競爭。生活的貧困與物質資源的缺乏是許多小人物面臨的挑戰，求得一餐一頓的溫飽及每一個平安的明天便是他們最大的希望，現實生活的困頓令他們幾無可能考慮到更遠大的志向。農村在工商社會的刺激下，傳統倫理道德或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皆受到衝擊，這又是鄉鎮場域中人們所面臨的另一個危機。

3. 鄉鎮小人物的「生存心態」剖析

黃春明描寫農村鄉鎮場域，關注的焦點並不放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上階

層的人物，即便他們是存在著的也僅僅是當作陪襯功用；¹⁷中下階層的鄉鎮小民才是他所要關懷的對象。就布氏的論點而言，個體的生存心態係由各人生長背景、受教經歷與適應社會的過程逐步形成，¹⁸這些鄉鎮中下層人物顯然沒有太多進入學校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個人過往的成長經歷與其所處環境之氣質氛圍無疑是其生存心態最大的形塑力量。

一般論及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往往都看見了這些生活在鄉鎮的小人物們相當善良、淳樸、堅毅不拔、犧牲奉獻等美好特質，¹⁹這的確是我們可以在這些代表性角色身上可以找到的；然而其筆下的鄉鎮小民倒也並非一味地呈現善良單純、毫無所求的生存態度，他們如同每一個社會場域出現的人物一樣，有自己基本的社會期望，時時刻刻在為自己的生活現實鋪排考量。雖然無可觸及上層社會結構，活動於生活場域中下層範疇的他們也擁有自己的企圖心與謀慮，只不過較之中上階層或城市場域，這些謀慮可能顯得簡易單純多了；或者更近一步來說，他們的企圖心是微薄且極容易被滿足的：經濟資本的基本充足與穩定無疑是這些貧困的小鄉民最大努力的方向，此外為他們所在乎的不外是生存的土地、親情的關係與人們的認同感了。

現代文明的入侵鄉鎮，對於他們慣有的生存心態而言是一大挑戰，他們並不希望場域裡原有的運轉公式遭到瓦解，期許保有原來的一切，即使事實上這些舊有的生活方式並未使他們活得特別富足或無慮，但傳統就是美好的觀念仍深植其心。而換一個角度來思考，或許小人物們其實可以感受到這股文明力量之大可能是他們所未能承擔的，因此經常以抗拒的心情面對；例如阿盛伯排斥在村裡建蓋游泳池，或是憨欽仔厭惡裝上擴大機的三輪車取代了他打鑼的工作，以及青蕃公固守著他胼手胝足辛苦耕耘的土地等。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角色是〈鑼〉裡面的憨欽仔，憨欽仔在時代變遷之際失去敲鑼報事這樣的好差事，打鑼工作的喪失的不僅是經濟資本，同時

¹⁷ 例如〈兒子的大玩偶〉中的電影院老闆、〈鑼〉中公所裡的官員、〈溺死一隻老貓〉裡的村長、幹事等。

¹⁸ 高宣揚：《布爾迪厄》：「生存心態是在歷史經驗中沈積下來和內在化為心態結構的持久秉性系統，它和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環境、行動經歷、經驗及以往的長期精神心理狀態有密切關係。」同註6，頁196-197。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生存心態也即是對其生存的社會客觀條件，不斷調適之下的產物。」同註7，頁114。

¹⁹ 例如何欣在〈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一文便強調黃春明作品中的小人物之所以特別引起注意乃是因為黃氏在創造這些角色時，安排他們在一個不理想的環境中卻能展現作為一個人所必備的自尊、堅毅、慷慨、博愛等美德。收入葉維廉編：《中國現代作家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頁461-493。

也是地位聲望之類象徵性資本的消逝；因為沒有收入失去消費能力，原本建立起來社會關係網也逐漸被自己不守信用的作為所破壞，可以說他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一落千丈。既希望有一條輕易維持溫飽的管道，又不希望自己淪為在他眼裡是更為低下的羅漢腳中的一員，憨欽仔努力建立起自己「與眾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他只是「暫時」和大家作夥，不打鑼的原因是因為他日行已久稍覺厭煩；直到最後事隔多時突然來了一份打鑼工作，他立即驕傲地擺脫掉原本就令他瞧不起、事實上也開始排斥他，令他名聲地位一落再落的那群羅漢腳，種種心理變化與行為表現皆可以看到，憨欽仔即使於本有場域中因經濟地位的低落，進而一併喪失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之時，還是試圖到另一個更下層的社會結構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網，並挽回一點象徵性地位。比較起那些無所事事的羅漢腳，「打鑼」這樣的工作在小鎮這個社會結構裡是受人尊敬的；場域中的氛圍與價值觀影響了憨欽仔的生存心態，除了擔心沒飯吃，他尤其害怕失去原本擁有的社會人際網絡與名聲地位，複雜矛盾的生存心態反應在憨欽仔的實際行動上。

〈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的生存心態亦是值得討論的。就場域裡的位置而言，白梅在擔任妓女工作時可謂是處於最低下的階層，或是一個最邊緣的位置，說來應該是沒有任何象徵性資本可進入到場域中進行交換，進而改變她原本處於劣勢的社會地位。然而生存心態固是持久存在且受個人歷史與社會結構所制約，但並不代表生存心態是凝滯不動的，個人的理智和自我期許也是可能更動原本的生存心態內容，進而影響其實際行為。²⁰白梅坎坷的人生經歷並沒有讓她自暴自棄，在與社會接觸的過程中反而令她進一步思索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東西，除了希望能夠擁有一個象徵新人生新希望的孩子，她其實也在乎社會上的人們對她的眼光，她亦希望被認同、被肯定，於是「孩子」與「母親的身份」似乎成了一種再進入到社會場域的媒介。回到家鄉之後的白梅因為良善的個性且巧合發生了許多幸運，因此獲得鄉人的肯定和尊敬，這必定是她之前未曾得到的。當期望嶄新人生的生存心態付諸行動，白梅拋下卑賤的職業、開展她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之後，社會資本與象徵性資本增加，她的社會位置因此改變，同時獲得了場域中人們的尊敬與認同；對她而言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也正是在此。

²⁰ 高宣揚：《布爾迪厄》：「生存心態具有自我調整、自我運作和自我創造的功能，它是復活了並具有自我創造力的歷史生命。」同註6，頁202。

從這些小說角色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鄉鎮裡的小人物們一樣對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地位有所期許；身處於社會結構中下階層的他們憑藉著本來擁有的各種微薄資本在場域中一次次做出交換，以期能贏得更多的資本，並因此能夠逐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二)城市場域時期

1.城市小說的社會背景與成員組織

黃春明的小說作品自七〇年代開始不再完全以熟悉的宜蘭家鄉為背景，故事情境所處的時空逐漸遷移至台北這個在當時於台灣島上堪稱是最符合城市條件的都市社會。當創作場域延展至城市，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的主題也有了改變，此時期作品反映出一個與前期創作中所見全然不同的社會環境與人物群性。

如果說農村鄉鎮場域時期之小說觀察重點著重於台灣農村社會變遷的反映，在本時期作家的關懷層面，除了是有城市場域中人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可能面臨的挫折與所做出的努力，另方面還進一步擴大到民族與國家困境的探討。²¹

出現於城市場域的人物明顯較之農村鄉鎮複雜許多，農人鄉民從作品中消失，跟著上場的是資本家、中產階級、銷售員、酒吧女子、日本遊客、美國大軍，以及跟著黃春明從鄉鎮一起來城市打拚的「城市中的鄉下人」……等等，與農村鄉鎮環境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物風貌。即使其小說所設定的社會背景和生活場域有所轉移，黃春明所關心的仍舊是那些容易受到忽視，或是於場域當中處於邊緣、下層位置，擁有較少社會資本的行動者；於鄉鎮中他關心的是農人、漁人、妓女、菜販、敲鑼者，來到城市他關心的人物亦是以生命中挫折多於成就的社會角色為主，如油漆匠、工人、售貨員等，另外則是為了對於所謂中上階層人物有所諷刺而建立的相關角色。

城市中的行動者其謀生型態亦豐富許多，整體社會是以商業活動為主

²¹ 此觀點之論述可見於多篇期刊論文之中，如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一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呂正惠〈黃春明的困境—鄉下人到城市以後怎麼辦？〉、林文華〈殖民與反殖民—論黃春明小說〉等。梁竣瑾《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中則認為其實在本文分類中歸類為第一時期作品的〈甘庚伯的黃昏〉裡已可見對日人的輕微批判，到了第二期的〈莎啞哪拉·再見〉則將這種批判心情完全地加以透明化與深刻化。諸文相關出版資料請參文末附錄參考書目。

軸來進行運轉的，無論是基層的勞動工人（〈兩個油漆匠〉、〈蘋果的滋味〉），或是鍋子銷售員（〈小琪的那一頂帽子〉）、酒吧裡的經營者和工作者（〈小寡婦〉），以及佔最多數的中產階級上班族（〈我愛瑪莉〉、〈莎啞哪拉·再見〉），城市人謀生的方式很多樣，但幾乎多脫離不了以工商為主導所形成的大型商業關係網。

2. 都市的場域氛圍與社會型態

隨著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鄉下人興起了一股「移民熱潮」，紛紛遷徙至城市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然而城市的環境事實上比較起他們熟悉的鄉鎮場域來得複雜許多，從生活形態到價值觀念都與農村環境迥異，於是這群懷抱希望來到城市打拼的鄉下人，首先便在新環境中面臨著嚴重地適應上的問題。

城市場域裡的民眾因為特殊的時代與環境，無論在時間上或地點上都更直接面對西方經濟的侵略；然而多數平民百姓並未能深入理解美日利用經濟上的優勢對台灣造成控制與壓迫的事實，他們只見到美國和日本以現代文明經濟強國的姿態出現在面前，於是連帶著使他們對於西方世界存有一種嚮往與美好的想像，進而產生出一種崇洋媚外的生存心態，²²〈蘋果的滋味〉與〈我愛瑪莉〉、〈小寡婦〉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城市場域資本交換顯得複雜許多，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性資本都受到經濟資本的牽動，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經濟資本在這個場域一樣也受到其他資本的牽制。資本之間的流動有時候是跨領域而行的，例如利用充裕的經濟資本來「購買」有形的文化資本，進一步提升象徵性的身份地位；而社會性資本充足的同時，又間接帶動著人物擴大其人際網路，進而對於其經濟資本交換動作時所需要的人際脈絡產生很大的幫助。如〈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就利用了經濟資本交換來種種物質以期經營出一種「美國式的生活」，企圖營造一種近於西方人的優越形象；而〈小寡婦〉中黃老闆為美國大軍所設計的酒吧，無論是和其他投資者之間的工作協商或利益分配，以及仰賴酒吧內工作的小姐透過自己的人際關係網，找來更多的人投入這一行工作，都是在利用社會資本與人際網路的建立，進一步利於其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²² 參見梁峻瑾：《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第四章第一節-二）之論述。（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124

3. 城市人的生存心態

學者呂正惠將黃春明的城市小說分成二類，一類寫鄉土人物到城市來謀生所產生的問題；第二類則是備受議論的所謂「買辦經濟」、「跨國公司」小說；²³出現於小說中城市場域的角色亦可據此分為二類來討論其生存心態，一類是從農村鄉鎮場域移轉至城市場域展開新生活、還在努力適應著的，尚不能稱上是的標準城市人的活動者，一則是存在城市場域已久的行動者。

在城市場域中活動已久的都市人，往往是在更有意識與更強烈企圖心的情況下進行一種資本的交換與社會地位的爭取行動，布氏理論當中的場域其實是一個充滿力量鬥爭場所，這一點尤其在城市場域中得到充分的驗證。²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我愛瑪莉〉中的大衛陳、〈小寡婦〉中的馬善行；〈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表現出一種典型的崇洋心態，現實生活中他一連串的洋派行徑一取洋名、追逐美國式的生活、最後甚至爲了奉承外國上司而將其即將棄養的雜種狼狗給帶回家裡，無論這隻狗可能或已經造成家人多大的困擾。在外國上司底下工作的陳順德，職場上卑躬屈膝、曲意奉承的生存心態一直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仍不能免除，外國人於工作職位上的優勢卻令他天真地以爲，將自己與自身生活環境改造如同「美國式」的生存形態將有助於他邁向成功一大步。

〈小寡婦〉中的馬善行亦是另一個拜倒於西方文明下的東方人，傳統中國文化在他眼裡僅是一個可利用的工具，用來謀取更多商機；他喜歡講英語、運用西方經營理念，認爲西方精神是必勝的秘訣，同時也是提高自己擁有相較於一般群眾不同的經歷識見與身份地位的一種媒介。對於這些城市人而言，個人的名聲評價與社會地位其實是與經濟上的成就同等重要的，不但要求物質環境優渥，他們更是有意識地經營運作自己擁有的象徵性資本，以期獲得場域中更高的象徵性地位。

屬於城市場域獨特的以西方文明爲貴的氣氛造就出場域中活動者的崇洋心態，多數個體若皆秉持著這樣的想法，又更進一步在場域中渲染著這樣的觀念，將形成一種崇尚西方文明而失去自我主體性的場域氛圍。

²³ 呂正惠：〈黃春明的困境—鄉下人到城市以後怎麼辦？〉，收於《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頁318。

²⁴ 參考高宣揚《布爾迪厄》第五章與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第五章第三節，同註6、7。

延續農村鄉鎮時期人們面對現代化現象的調適過程，移居到城市裡的鄉下人仍舊在新的場域裡面臨著這個艱困的難題。然而他們在鄉鎮場域中面對現代文明文化時，遭遇的是一種外來力量的侵襲，外在力量的入侵會帶動整體社會氛圍的改變，進而影響場域中人們慣有的思維方式與生存心態。若將鄉鎮場域的人群與城市場域的人群加以比較，畢竟是在自己熟悉的環境當中，他們似乎擁有多一點的能力與勇氣對於一切改變加以思考或質疑；鄉鎮中的居民如〈溺死一隻老貓〉中的阿盛伯極力反對建蓋現代游泳池，拒絕現代文明侵入家鄉，〈鑼〉中的憨欽仔對於取代其打鑼任務的三輪廣告車嗤之以鼻。抵抗成功與否之外，我們首先見到的是這群人在內在心情與外在態度上對於新文明力量的質疑與抗拒。

小說環境改變的理由是因為人們在不同場域中進行位置的遷移；同是新舊價值文化的衝突，這些懷有傳統舊有觀念與保守生存心態的鄉下人物來到新環境，其生存心態往往無法立即扭轉為適合新場域的思考方式，更因為陌生所產生的畏懼而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與對抗的勇氣，盲目地吞食著新環境新人物或新思維所投與他們的一切，態度轉為更加徬徨、茫然、不知所措，甚至進而妥協或放棄（或者是遺忘）原有理念。例如〈兩個油漆匠〉中的阿力和阿猴、〈蘋果的滋味〉中受了重傷卻不知該喜還是該憂的阿發一家人。

〈蘋果的滋味〉中的阿發一家人一樣是被表面上華麗美好的西方物質文明所迷惑的百姓，不過相較於陳順德的諂媚洋，這家子因為無知而引發的一連串令人又好笑又鼻酸的事件就值得同情多了。我們可以發現這群鄉下人即使來到城市場域，仍舊相當程度地維持舊有成長生存背景所造就的一種比較淳樸憨厚的性格，在他們擁有的簡單思維當中，很自然地以所能看見與所能碰觸到的實質上的利益為好壞的判斷標準；經濟利益依舊是生活並不寬裕的他們最在乎的資源，至於其他的社會、文化或象徵資本，如同那些生存在單純鄉鎮場域卻一樣遭遇生計之困的小鄉民們，似乎仍是他們無力考慮到的。

相形之下〈莎喲娜拉，再見〉的黃君則因受過較多的教育，擁有比較多的個人文化資本與思考能力，在面對相同課題時則表現出批判的態度；生長於鄉村的黃君帶著自身原有的傳統價值體系來到城市場域時，面對新社會截然不同的運轉方式與不一樣的價值標準，他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生存心態，才足以在新社會結構裡佔有一席之地，成功地進行資本交換。然

而原本的價值判斷卻一直受到新文化的衝擊，他不禁開始懷疑起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東西其實比經濟利益來的更重要？當他帶著日本嫖客來到自己的家鄉礁溪，熟悉的環境喚起內心深層的正義感與良知，看見自己爲了經濟利益而扭曲了的生存心態；故事發展到最後他利用精通二國言語之便擺弄了日本嫖客與大學生，雖然這樣的反擊是多麼微不足道，但是起碼一定程度地安撫了黃君長久以來，對於自己向生存環境不斷妥協所引發的不安與自責。

(三)城鄉差異階段

1.場域的再度轉移

1986年之後，黃春明小說的社會場域再度從城市回歸到鄉村；然而與第一階段農村鄉鎮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的作品雖然也以山村小鎮做爲小說的故事背景，其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結構與場域氛圍，已經和第一階段的鄉鎮景況截然不同。如果依照著小說時空的推移狀況下一個比較感性的說法，也許可以將其解釋爲第一階段中那些奮力求生存的鄉下人，或者已出走到城市裡去，或者已經隨著歲月的延展慢慢邁向老年。較爲理性客觀的分析則是，黃春明此時期的作品是有意識地將關懷重點移轉回鄉下，城鄉差距日益嚴重、鄉村的沒落與人口的凋零、工業化與資本化對傳統農業社會在生活形態、價值觀與生態景觀上形成的衝擊與破壞，成爲他作品中最重要也最主要的討論議題。

此時期鄉鎮的人口結構以老年人爲主要成員，一方面亦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工商業明顯取代農業，商機發達的城市勢必吸引其他農村鄉鎮場域的人群前往就業定居。年輕一輩的成員紛紛離鄉出走，留在家鄉的幾乎就是年紀已長的父母一代。當然也由於作家在此時期明顯將其關懷重點放在這些爲社會所忽視的退休老人身上，所以我們所能看見藉由小說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狀態，主要便是以老人們爲主角所進行的種種活動。這些老人幾乎已經停止所有的經濟活動，有的等待定居外地的子女定時寄來生活費用（如〈打蒼蠅〉中的林旺權夫婦），最多從事一些簡易的農耕養畜等工作（如瞎子阿木在女兒離開之後接替餵豬工作、〈放生〉中阿尾伯不時到田裡巡走）；無論以市場交易、遊戲或利益交換來形容場域中資本來往的情形，此時期農村裡的各種資本流通狀況因爲社會成員的特殊屬性一年邁的

退休長者一都已減至最低。

七〇到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特質之一便是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城鄉之間形成更強烈的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一直延伸到九〇年代都始終存在。人們將所有的發展重心都聚集於城市，精華人口紛紛離開家鄉湧向城市，²⁵都市急遽發展，鄉村的前進腳步卻是極為緩慢的，城鄉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嚴重的生活水準落差；例如〈現此時先生〉便表現出一個文化落後、消息封閉的山居景觀，報社甚至不派人送報到這個小山村，住在這裡的人群彷彿與外在世界隔絕了一般。

2. 城鄉差距所反映出來的場域氛圍

黃春明的作品透露出城鄉差距訊息其實在前二期中已是有跡可尋，小說中兩種不同生長環境中的人物也表現出異樣的生存心態，間接反映出「城」與「鄉」之間無論在環境發展、場域氛圍、群眾心態上都有很大的差別。鄉鎮場域的人物面對現代文明的入侵是無法接受的，如〈鑼〉中的憨欽仔、〈溺死一隻老貓〉裡的阿盛伯；而鄉下小民在進一步走入城市場域後，面臨差異甚大的生活形態也未能良好適應，如〈兩個油漆匠〉裡的阿猴和阿力、〈蘋果的滋味〉中的阿發一家人。城鄉差異或者不一定是這些作品最主要的焦點，但是這樣的現實社會情狀，事實上已微妙曲折地反映在小說中。

相對於第一階段的農村小鎮環境，我們會發現城鄉差距漸趨嚴重與社會價值觀的巨變是造成地域空間相同，場域內涵變化的主因。第一階段農村鄉鎮場域中的社會成員面臨的三大課題，是現實生活環境的挑戰與新文明對於傳統社會的衝擊；本時期的鄉鎮環境中的年長者除了面對時代變遷，社會價值觀隨之改變的問題外，年輕人口的大量外移令整體生活場域呈現出一種落寞寂靜的氛圍，也是他們另一項人生考驗。工商業的發達除了改變了農村的場域氣氛與人們的價值觀念，甚至也改變了原本農村場域中的自然型態，對生活環境造成了污染；城鄉之間不但存在差距，甚至還

²⁵ 周永芳：《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研究》即論及：人口外移或可促進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交流，但亦有許多不得忽視的隱憂：1. 外移人口皆年輕力壯或較高教育程度者，數餘農村社會結構中的優秀份子，他們的外移將影響耕作人口的品質。2. 留在農村裡的多年紀較長者或有資質駑鈍者，一、二十年之後將有後繼無人的憂患；農村中青、壯年大量外移，乃造成農村沒落和都市繁榮的主因。（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第一章第三節。

形成衝突，²⁶一再地挑戰著留守家鄉並企圖保有傳統原貌的老人們原本的生活習慣與期待。

此時期的作品裡，作家主要著重於刻畫老人們的心理對話，反而減少對社會活動的描述。出現於此階段的時空場域經常是鎖定於幾個特定的場所，如〈現此時先生〉中小說場域定於廟庭的榕蔭下，〈售票口〉直接將小說鏡頭鎖定於窄小的車站裡，藉由角色的對話或人物緩慢的行進來往維持空間的動態，並間接描繪出有限的場域空間。其他如〈死去活來〉、〈瞎子阿木〉或〈打蒼蠅〉，小說中亦並沒有出現過度的場景移動，即使有也是以存在於主角人物的過往回憶當中為多；這樣的安排事實上也說明了老一輩的長者相對之下行動力已減弱許多。透過老人的心理活動或些微的行動所呈現出來的因此不是靈動的生活景象，反而烘托出一種沉緩的整體氣氛；一個安靜到容易為人所遺忘的世界。

3. 老年人們的生存心態

這個時期的社會場域中見到的是比較少的資本競爭活動，無論是經濟資本或象徵性資本，對於這些年長者們而言似乎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在昔日所依賴的社會關係網中，他們想取得的已非藉由社會關係來得到什麼樣的社會資源，²⁷而是依靠這些人際關係來讓安靜的日子有一點不一樣的妝點，有人可以說說話，或是在他們需要幫忙時給予簡單的協助。

當年輕人離鄉而去，受到現代文明與城市文化的洗禮之後，原本生長歷程中所形塑出來的生存心態自然受到新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原生家庭與親情相較於事業或自己新的生活反而變成是次要的東西，舊有的價值觀已受到不同場域氛圍和社會價值觀影響而改變。然而停留在原本時空環境的老年人們面臨的則是地域位置相同，但環境景物開始改變的遭遇，例如〈放生〉文中工廠進駐農村、〈售票口〉中年輕一輩離鄉出走、〈打蒼蠅〉中新式別墅的蓋建等。活動於其中的人事物不再熟悉，傳統的價值判斷與倫理觀念受到外界無形卻強大的衝擊而有了巨大的變動；隨著年輕一輩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來來去去，不可能不感受到外在世界的改變，因此在心

²⁶ 〈放生〉一文即描寫八〇年代宜蘭大坑畧遭受工業文明污染的農村生活與當地人民抗爭行為。

²⁷ 布爾迪厄定義下的「社會資本」是指藉助於所佔有的持續性社會關係網而把握的社會資源或財富；在某種條件下，這種資本亦可轉換為經濟資本，而且可以以崇高頭銜的形式予以制度化。參見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同註7，頁151。

態上也不得不做出調整以能適應新的價值體系；其心情往往是不斷地掙扎，在現實環境與生存心態所熟悉的模式相衝突的情況之下，他們仍須不斷地調整與勉強自己去適應；辛苦之際不免有許多的慨嘆與惆悵。

再則老人們退休後的生活不但是讓原本充實忙碌的生活一下子空閒下來，同時也可能造成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流失；沒有收入與人際關係互動頻率的銳減，生活失去了以往的積極繁忙，生存心態轉為消極而無生氣。〈現此時先生〉中的現此時先生和那一群聽他讀報的老人們，每天聚集在三山國王廟廟庭的榕蔭下讀報與聽報，〈打蒼蠅〉中林旺穰不時以打蒼蠅解悶，〈售票口〉裡的一群長者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在子女打算返鄉之際，一大清早替他們到車站排隊購票。

此時期場域中的長者逐漸退離社會結構中各種資本競爭市場，最令他們在意的就是親情、家庭與子女了。〈售票口〉中那群爲了子女心甘情願頂著冷冽的寒風一早上車站去排隊買票的老父母們，心情是既欣喜期盼，但又夾雜幾許感慨怨懟的矛盾感受；但無論如何慨嘆，時間到了這群老人一樣準時地聚集在車站裡爲外地的孩子排隊購票。又如〈最後一隻鳳鳥〉裡也已經很年邁的新義，對於多年不見的母親仍不歇止地掛念；無論如何希望享有最後一段天倫之樂，彌補多年來的缺憾。

我們會發現走到人生的尾聲，許多心情和態度都已經和年輕時大有不同；這個社會如何運轉對他們而言並不是多麼緊要的事，外在環境的急遽變化，年紀的增長與身體心理的衰老，生活中的孤獨與寂寞感都是影響他們生存心態轉變的理由。對於自己周遭身邊的親人，尤其是孩子們，他們有更多精神上的依賴與在乎，這是和城市場域的年輕人一個很大的差異；環境的不同，存在於其間的社會個體不同的生存心態、不同的人生觀注焦點，影響著不同時空場域呈現出不同的氣氛與價值標準。

三、結 論

黃春明的創作隨著個人現實生活中居住環境的遷移，小說中的場景亦不斷改變，因此不同時期的創作所反映出來的正是不同社會場域的活動狀況。曾有學者提出一個作家對於自身創作中地域空間的選擇通常受到兩種

情況的制約：作者本身的生活經歷以及作品材料的客觀內容；²⁸與其說黃春明是受到環境與經歷的制約，不如說是他喜於從身邊熟悉的人地事物著手觀察描寫，而隨著他生活空間與經歷的轉換變動，視界亦隨之改變，這是其作品最大特色之一。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一直是他小說中的關懷焦點，他企圖呈現出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生存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心情。

而布爾迪厄將不同社會環境視為各具不同內涵與特質的活動場域，場域中的活動者受到原本環境的影響，形成不同的生活態度與生存心態，其擁有的生存心態又進一步影響著活動者所處社會環境展現的特色。活動者與社會環境互相影響形塑之下，每一個社會場域都擁有其特殊的氛圍、價值體系與運作方式。布氏對於社會結構的此種分析理論，運用於研究不同社會場域之特色差異時，亦是一種可行且有趣的方式。

即使我們所能見到的是黃春明小說世界中社會場域不斷變遷的現象，但如同劉春城先生所著《黃春明前傳》一書中所提及的，其實他的小說世界只有一個台灣社會，他寫出了廣大群眾的生活；²⁹存在於這塊土地上的種種生活場域都可能是他小說中的素材，因為那些在各個地域空間真實生活著的百姓們，永遠是他最想要關懷的對象，這正是黃春明小說之所以受到肯定並感動著這塊土地許多人的最大理由。

文學畢竟是一種創造工程，利用文學作品來認識理解一個時代的生活場域和社會情狀時，我們不能不考慮現實與藝術之間可能的差異。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文學作品仍舊具備反映社會現實與時代思想的基本條件，其本身反映出的也是一個「社會」，藉由文本的引領，讀者透過作者的眼睛來認識他所看見的世界；因此本文便在這樣的思考基礎之下，將黃春明的小說創作依據故事中所依存的不同時空背景與社會空間，將之分成鄉鎮場域時期、城市場域時期、城鄉差距時期，分別討論三種主要的社會場域當中人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的情形；利用不同的地域背景，表現出不同的社會主題，進而呈現出不一樣的場域氛圍，也間接地反映了台灣六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社會變遷圖像。

²⁸ 同註10，頁62-63。

²⁹ 同註1，頁3。

四、參考書目

(一)專著：

1. 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2. 黃春明：《鑼》，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3. 黃春明：《莎喲哪啦·再見》，台北市：皇冠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4. 黃春明：《放生》，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
5. 黃春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市：皇冠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6. 劉春城：《黃春明前傳》，台北市：圓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
7. 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台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
8.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社，1987年2月初版。
9. 邱天助：《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2月初版。
10. 高宣揚：《布爾迪厄》，台北：生智文化，2002年6月初版。
11. Pierre Bourdieu：《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構成》，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初刷。
12. Patrice Bonnewitz：《布爾迪厄社會學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2月初版。

(二)期刊論文：

1. 何欣：〈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收入葉維廉編：《中國現代作家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年10月，頁461-493。
2. 蔡源煌：〈小人物的面具—試論黃春明小說中的表意衝突〉，收於《中華復興文刊》10卷9期，1977年9月，頁34-42。
3. 呂正惠：〈黃春明的困境—鄉下人到城市怎麼辦〉，收於《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頁318。
4. 梁明雄：〈論黃春明的鄉土小說〉，收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1993年2月，頁361-374。
5. 楊照：〈吹到臺北的一陣蘭陽風—札記黃春明的作品〉，收於《聯合文學》10卷10期，1994年8月，頁88-92。

6. 陳敏郎：〈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布迪厄論正當性的建構及其再生產〉，收於《思與言》32卷3期，1994年9月，頁113-138。
7. 翁銘鴻：〈筆寄臺灣的鄉下人—評黃春明小說特質〉，收於《傳習》第16期，1998年4月，頁109-115。
8.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收於《成大歷史學報》25期，1999年12月，頁321-337。
9. 林文華：〈殖民與反殖民—論黃春明小說〉，收於《臺灣文藝》(新生版)177期，2001年8月，頁62-71。

